



蒲公英 ■蒋树勤

我的40年

# 改革改变人生路

■姜德福文

我今年74岁,身逢改革开放的太平盛世,在干休所里过着幸福美满的晚年生活。我们这一代人,注定与改革有缘,既是40年改革实践的亲历者,也是改革成果的受益者。我们的成长进步同国家和军队的改革发展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改革改变了我的前途命运,改革改写了我的人生里程。

## 春风吹进北大荒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帷幕。那时候的我,正在北大荒的一所“五七干校”里劳动改造。那是1974年那个寒冷的春天,在北京一个军事首脑机关工作的我,莫名被发送到了东北牡丹江畔由一个农场改称的“五七干校”,天天喂猪、养鸡、种菜,用劳动的汗水冲刷身上的“骄傲”二气和“主观主义”、“唯心主义”。

干校在一个山沟沟里,十分闭塞。报纸几天才能送一次,我们只能从自备的半导体收音机里收听新闻。从收音机里,我们悲痛地听到了毛泽东逝世的噩耗,我们自发地搭起灵台,从山坡上摘来野花扎成花圈。当时,在干校劳动的老干部中,有七个红军老战士,他们跟随毛主席南征北战,对毛主席感情特别深。毛主席逝世的消息传来后,他们一个个泪流满面,悲痛欲绝。我逐一采访他们,写下了一篇追忆文章《毛主席,红军战士想念您》,登在当地的《牡丹江日报》上。从收音机里,我们又听到了“四人帮”垮台的消息,我们喜不自禁,用自己烧的土酒,一杯又一杯痛饮,直到把自己灌醉方休。

最大的变化,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吹进了“五七干校”。本来,我已作好了一辈子在北大荒扎根的思想准备。1978年之后,随着党的干部政策的落实和冤假错案的平反,在干校的一些领导干部陆续调回原单位,有的官复原职,有的出任新职务,我们看到了新的希望。终于,有一天从北京来的一位首长召见了,征求我对下一步去向的想法和意见。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首先表态表示服从组织的安排。只是考虑到妻子长期与我两地分居,独自带着年幼的儿子上下班,十分辛苦。我试探着提出,如有可能,可否把我调到妻子生活的城市去。首长说他

回京后去协调,让我静候佳音。不久,一纸调令从北京下来,我遂愿调到了妻儿的身边。三中全会改变了我的命运,我终于告别劳动生活了五年之久的“五七干校”,走出了北大荒的深山老林,重新分配在空军的一所医学院校工作,开始任宣传干事,不久升任为宣传科长。

## 圆我大学梦

1982年的下半年,邓小平在军委的一次会议上讲到军队后备干部的培养。小平提出要在全军选调一批相对年青,有实战或实际工作经验的师团级领导干部,进学校补习文化知识后再到高等学府深造,作为军队培养接班人的“第三梯队”来储备。

为贯彻落实邓小平这一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改革举措,军委在全军基层和机关中层层选拔,从军事、政治、后勤三类干部中各选出上百名师团级干部,从1983年秋季入学开始,进行脱产三年的院校培训,毕业后发大学学历证书。

我十分幸运地成为百名政治干部的其中一员。我1962年入伍时,高中没有毕业,在年将40岁时,已是正团职干部的我,终于圆了“大学梦”。第一学年,军事、政治、后勤三个班的近300名干部,全部集中在长沙,在特地改为解放军干部文化学校的原铁道兵学院补习初高中数理化 and 语文知识。学校从湖南省多所重点中学特招一批优秀老师入伍以充实师资力量。我十分珍惜这难得的机会,学习认真刻苦,光学习笔记就做了二十多本。一年下来,我以四门课程全优的成绩顺利转学。第二学年,300名学员分赴在北京的解放军军事、政治、后勤三所学院深造,我进了解放军政治学院的“高级指挥班”学习。我记得当时开设的课程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国际关系与外交、中共党史和军队政治工作等10多门。学习期间我撰写了10多篇论文,有一篇在部队调研时写的关于军队思想政治教育要克服“假太空”的文章,在院刊“思想战线”上刊登。到第三学年的时候,军队院校改革,军事、政治、后勤三大学院合并成立国防大学。国防大学的任务是培养军队复合型的高级指挥干部,以任职培训为主。所以,我们既是国防大学的第一批学员,也是唯一一批三年制的学历教育学员。

三年中,我们既学文化,又学军事、后勤、政治。毕业时进行综合考核,在指挥所里进行图上防御演练。那时中苏关系紧张,我被赋予“集团军指挥官”的角色,率所辖的“陆军”、“空军”、“海军”、“炮兵”、“装甲兵”、“二炮”、“工兵”、“防化兵”等兵力在我国的西北方向,防御“敌军”三个师的入侵。激烈的“战斗”进行了一昼夜,我要根据“情报”部门给出的各种敌情变化,确定我军的主要防御方向,排兵布阵,指挥“千军万马”,击退敌人一次次的进攻。“战斗”结束后,考核官给我亮出的成绩是:“优秀”。在毕业典礼上,我作为政工班百名学员中唯一一名受到大学嘉奖的学员,走上领奖台。

这三年的入校深造,不仅圆了我的“大学梦”,更重要的是为我后来的工作学习打下了坚实的文化基础和理论基础。我记得毕业时,国防大学的首任校长张震上将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作为军队的后备干部,你们要时刻准备着,一旦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要呼之欲出,担当使命。”毕业后,我回到了原单位,升任为政治部主任。多年来,无论在什么岗位上工作,我都牢记将军的嘱咐,时刻准备着!

## 道路越走越宽广

1993年夏天,我奉命调到上海出任编辑部设在的一所军事院校里的一本军队政治理论刊物的主编,回到了阔别30多年的故乡。

我的老家在离浦东金桥镇不远的的一个农村。在浦东开发开放中,金桥的定位是加工工业区。昔日晨昏各一次从庆宁寺和县城川沙间对开的小火车早已不复存在,一条狭窄的乡间煤屑路杨高路也变成了宽敞的柏油马路。在河浜纵横田园阡陌的乡村大地上,一座座现代化的厂房和高楼大厦拔地而起。长期以来,轮渡是黄浦江两岸的唯一联系,而现今继南浦大桥、杨浦大桥之后,又架起多座桥梁,江底还有隧道贯通。一条条高速公路、高架路等架构出一个大大的“申”字通向四面八方。黄浦江两岸的变化实在太大了。记得回上海后第一次去浦东探访,小车从杨浦大桥下来后,在罗山路立交桥周边来回转了好几个圈,竟然找不到回家的路了。老家早已拆迁,代之而起的是排排别墅群和大型的超市、商务楼。

难忘1994年元旦前夕,近90高龄的邓小平视察浦东,冒着严寒兴致勃勃地登上杨浦大桥。老人家笑吟:“喜看今日路,胜读百年书”。小平所说的“今日路”,不仅是他所看到的浦东新修的内环线,更是我们党在改革开放中所开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寓意十分深刻。

杨浦记忆

# 商店内外如烟往事六——一本励志之书

■刘翔文

最近我一直在家里外寻找一本当年在长白新华书店购买的,这是一本1974年7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农场的春天》短篇小说集。但始终没找到,估计是1977年高考后,从农场返回市区读书整理行李时遗失了,心中沮丧了好长时间。

1976年4月,我就是怀揣着这本书,踏上了崇明岛上的跃进农场,迈开了农场人生第一步。

后来总算在孔夫子旧书网上花“高价”再次网购到了。那天,捧着快递员送来的这本已经出版了整整40年的旧书,可谓百感交集。虽然手上的这本《农场的春天》不是我当年购买的原书,但望着那熟悉的封面,岁月仿佛顿时又重新流淌回上世纪七十年代。年轻的我,对即将开始的海岛农场生活充满着新奇与憧憬。可是,未来自己工作和生活的农场环境究竟是怎样的?则一无所知,那时的崇明岛对市区居民而言,是很“遥远”的。因此,迫切想恶补一下这方面的知识。

那天在长白新华书店看到书柜上陈列着一本名为《农场的春天》的书,封面上一名肩扛铁锹、身穿红衣的男青年,英姿勃发,一下子就吸引住了我的目光。连忙请营业员拿来一看,此书系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创作丛书,由上海市市属国营农场三结合创作组编辑,书内15篇短篇小说全部是在崇明等地农场知青们创作的。太巧了,此时的我,正需要这类“专业对口”的书籍来增加对将要开始的农场生活的感性认识。于是,我毫不犹豫地掏出身上仅有的一元零用钱递给营业员,花五角二分买下了这本书。几天后,我便将此书作为随身携带的重要行李之一,搭上了驶上崇明岛的双体客轮。

40年后,重新捧读此书,审视当年自己阅读此书的心态,觉得有些荒

唐和可笑,但这确实就是那个时代农场知青的真情实感。

作为曾经的数万农场知青大军中的一员文学青年,我依然深深惦念这本书,感谢他们在特殊年代创作的精神食粮,为广大农场知青荒芜的精神家园“播”下了一抹绿色。如果用现今价值观来评判这本书,肯定是有争议的,但我觉得这种争议是历史学家和文学评论家的事。不管怎样,这本当时印数达到20万册的书,对一代年青人来说,在他们的青春记忆之中是永远不会磨灭的。在那理想、前途渺茫和文化贫瘠的年代,这些知青作者们还是十分虔诚地用自己手中的笔在致青春。这本《农场的春天》书,也应是的一本励志之书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随着长白地区周围新村人口不断增长,为改善老百姓的购物环境,区政府拆除了这座简陋的回字形环形建筑,原地建造了一幢颇具现代感的百货大楼,长白商店也改名为长白百货商场。如此一来,上世纪五十年代就诞生的长白新村综合商店,内涵与外延都扩大了,给人一种上档次的感觉。尤其是百货大楼底楼沿着延吉东路的那一排布满琳琅满目商品的橱窗,不仅吸引了老百姓的眼球,也给那条寂寞清冷的延吉东路增添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在那个人们钱袋子还不鼓囊的年代,上海老百姓兜商店主要还不是购物,而是人看人热闹,看琳琅满目橱窗。那时的橱窗布置绝对是一门凝固的艺术作品,有商店内的专职美工师傅布置。再后来,随着控江路商业街的兴起,以及人们生活追求的提高、消费习惯的改变,长白百货商场的客流量日趋稀少,最终只得关门打烊。这座曾经让长白地区老百姓引以为傲的百货商场,被夷为平地,建造起了住宅楼。

岁月很短,记忆很长。闲笔记事,最是商店。(完)

意犹未尽

# 重拾记忆中的味道

■林可依文

春节期间,我和先生一起去逛街。

鞍山商业区到处都是人流,大家脸上都挂着喜庆的微笑,一派节日祥和欢乐的景象。我们信步走进环球食品店,这里更是摩肩接踵,顾客们都忙着选购自己心仪的过节食品。

忽然,我的目光被柜台上一袋休闲食品吸引了。在我惊喜地发出尖叫的同时,先生也看到了,他的脸上也同样流露出惊喜的神情。我迫不及待地抓起一袋,叮嘱先生赶快去付钱,自己则拿着那袋零食慢慢地欣赏起来。炒米糖、油枣、梅花糕、蛋黄条、黑方糕……都是我小时候熟悉的年味。

不一会儿,先生付了钱回来了,我们拿着那袋食品忍不住相视而笑。先生感慨地说了一句:“以前你爸爸每年过年都会买这个。”我点点头,眼眶却不自觉地有些湿润了。

每逢佳节倍思亲,一袋老上海的特色休闲食品虽然不昂贵,也不高大上,却曾经是我最美好的童年记忆,也是对过世的父亲最美好的回忆之一。

确实如先生所说,父亲一直对这些老上海的小吃情有独钟,小时候每

年过年,这些都是他必买的零食。我还记得小时候,我们家有一个规矩,大年初一大早醒来,先要给父母拜年,说些吉祥话。说完之后,就可以吃头晚上父母为我们准备好的放在糖果盆里的零食。而这盆零食里大部分便是父亲买的这些特色小吃。我还记得,父母常常关照我们吃零食也是有顺序的,第一个要吃长生果,寓意着长命百岁;第二个吃糕点,含义步步高升;第三个才吃糖果,意思是甜甜蜜蜜。但每次我都悄悄地先拿了炒米糖,因为小时候这是我最爱吃的零食。又松又脆,还甜甜的。至于那些规矩,在美食面前,早就被我抛到了脑后。

稍年长些,经济条件比以前好了,规矩也改了,不用再大年初一早对父母说那些让我想起来就头痛的吉祥话,果盆里的零食也变得高级了许多,各色蜜饯、牛肉干、坚果等都有了,但父亲仍然保留着买这种传统小食的习惯,每年春节如此。

当然随着生活条件越来越好,这种小食买起来倒也不容易了。在惊叹现在还能买到这种零食的同时,我忘吃上几块炒米糖,还有油枣,在一堆琳琅满目的零食中,我觉得它们别有风味,有一种年的味道和记忆中的美好。